

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

李培林

Abstract: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Two trends cause economists increasingly to apply RCT to the social field, and some sociologists make their criticism more radically, even the “economic imperialism”. This paper proposes rethinking RCT on the base of new performance and some important revisions of the theory. By discussing questions such as the peasant rationality, family rationality, orient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rationality in the experiential studies, the paper tends to answer how to realized the social 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 and what the possibl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of RCT is.

理性选择是一个古典的话题,近几十年来,一派学者试图使其成为社会科学三大经验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解释社会行动的统一理论和方法,很多社会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不断努力(Colman, 1986; Friedman & Hechter, 1988; Lindenberg, 1990; Abell, 1992; Hedstrom, 1996),但另一派学者则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Bohman, 1992; Scheff, 1992; 斯乌利, 2000)。最近我在参加国内的一些课题成果评审和博士论文答辩的过程中,深感在此方面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混乱。这也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1期曾特意出了一期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专号,试图厘清这方面的一些认识。现在看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讨论。

对于这种理论和方法论取向上出现的张力,有的学者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激进主义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化解这种张力,必须追根溯源,返回对主体的自问,返回古典理论,至少也要返回到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分立初始,返回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兴功利主义传统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古典理性传统的形成(吴国盛, 2001)。这种讨论很有必要,但为了应用的目的,本文的讨论更加侧重于返回经验本身。

关于什么是“理性”,可能和关于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一样,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经验学科排除“形而上学”问题的办法,排除一切非工具性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理论理性等等)的讨论。换言之,理性选择理论所说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但是,随着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之间争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众多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理性选择理论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它的一些基本的假定也都经过了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些修订和完善应当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

1. “理性人”的假设对“社会人”的包涵

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派进行经济分析的共同逻辑前提,它主张人们的一切经济行动都受物质利益的驱动,但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关于“社会人”假设的对抗。多数社会学家更倾向于认为,现实中的社会行动(包括经济行动)有着复杂的动因,仅仅从经济单向维度来解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很多非经济因素是决定人们行动的重要变量。

例如,什么是“利益”?多数人都认为而且科学也证明吸烟有害,但现实中仍存在大量烟民,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烟民的吸烟是非理性的自杀行为。为了能够包容这种利益需求上的个体差异,经济学家引进了“效用”的概念,来表示对某种需求的满足。

对某种效用的追求,起初被理解为某种“稳定的偏好”,但现代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需求是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在食品衣着等需求基本满足以后,人们会追求安全、成就感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偏好”也并不总是稳定的。为了对此做出解释,经济学引入了“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来说明效用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对象的一种不变属性,随着人们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的增加,其效用的增速会降低,这种边际效用最终会跌到零甚至低于零。

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主要受其个人内化的偏好影响,而不是受其他人的决策和行动影响,如果每个人的偏好都取决于其他人的偏好,市场均衡理论就无法测定和成立。但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表明,“制度”类似一种公理化的自然习俗或生理学上的习惯性上瘾,它对个体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在一种制度下个体的行为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产生趋众行为(North, 1990)。凡勃伦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探讨了个人消费选择之间严重的相互影响(Veblen, 1994/1899),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通过对“广告”的研究揭示了卖者对买者行为的影响(加尔布雷斯, 1983/1973)。所以,目前“理性人”的假设,已经是假设在一定制度下的、偏好受多方面影响的、在追求并非单一经济利益的“效用”的理性人。

2. “完全竞争”的假设对“公共选择”与“合作”的包涵

其实,早期的理性选择论者帕累托就已经看到,现实中不仅存在“经济效用”,还存在“道德效用”,如经常参加宗教礼拜。帕累托认为必须区别共同体作为整体的效用最大化和共同体作为个体聚合的效用最大化,理性的公共选择必须以后者为目标,追求在一些人获益的同时,其他人也没有损益,他用这种“最优”概念取代了“最大化”概念,这样“最优”实际上既是经济最优,也是道德最优(Parito, 1966)。尽管“帕累托最优”往往被认为只是一种神话,但它却成为后来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成为评价竞争结果的一种限制。科尔曼也探讨了竞争中个体利益如何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问题,他认为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规范这样的“社会资本”,所以会出现为了得到社会资本而采取的“单边资源让渡”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现代的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Coleman, 1990)。此外,博弈论揭示了竞争中合作的重要性,证明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个人效用最大化行动可能对个人和可能的合作者都是最糟糕的结果,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们熟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个体不得不就是否揭发对方做出选择)(Elster, 1989)、“贡献者困境”(Cont-

ributor's Dilemma, 个体不得不就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何等贡献做出选择)和“撒玛利亚人困境”(Samaritan's Dilemma, 个体不得不就是否帮助别人做出选择)(Palfit, 1986)。这样, 竞争实际上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 共同行动中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选择, “合作”也就成为竞争条件下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3. 理性“最大化”假设对“次优选择”和“X 效率”的包涵

“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定, 都是以经济分析最大化原理为出发点, 其含义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厂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获得过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西蒙认为, 这种假定的前提是, 经济人具有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 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 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 但现实中的人都具有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度, 因而是“有限理性”的人, 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 他们通常不是在所有被选方案中追求最佳方案, 而是追求“满意”的方案, 或者说“次优方案”。就像一个博弈者, 他实际追求的只是取胜的途径, 而不可能是取胜的最好途径(Simon, 1982; 张宇燕, 1992)。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 厂商总是在既定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出最大化和单位成本最小化。但自从1966年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提出X(低)效率理论后, 人们一直在积极批判性地重构新古典学说。莱宾斯坦观察到, 企业内部不是组织效率最大化的, 因为内部组织的简单变动就可以增加产出, 厂商也不是利润最大化的, 因为厂商并不按边际分析原理经营, 这种非配置性的低效率现象, 莱宾斯坦称为X低效率。他的后继者们认为, 造成X低效率有各种原因, 关键是生产活动不是可以借助现代数学和物理方法描述的技术决定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活动相联系, 任何人都有追求最大化和不追求最大化的两面性, 这两种倾向的对立和并存, 决定了新古典学说所谓完全理性的人只能是一种极端和个别的情况, 通常的情况是, 个人的理性选择只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才进行理性最大化的计算, 更多的决策则依赖于习俗、惯例、道德规范、标准程序和模仿的形式作出(一般不是非理性最大化的)(Frantz, 1988)。

由此可见, 所谓的理性最大化, 只是在具有充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充分能力的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 而在通常的情况下, 理性选择的结果一般只能是“次优”或存在X低效率的。

二、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

1. 关于“小农”理性命题的悖论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传统乡村的研究中, 传统的小农在很长一段时期, 一直被视为一个另类, 通常被描述成传统、封闭、保守的群体象征符号, 由于多数的此类研究是采用参与观察的个案调查方法, 更注重远离“宏大历史记述”的非文字经验事实、集体记忆和口述文化, 因而努力挖掘的往往是个案的特殊性。即便探讨小农行为一般规则的研究, 也往往强调这种规则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行为规则的特殊性, 特别是强调这种特殊行为规则的文化意义。在这样的探讨中, 小农的生存方式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 并不因为普遍的现代化而发生彻底的转变, 所以把传统乡村的小农纳入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 被认为是一种学术上的“武断”。

为了说明这一点, 人类学家习惯引证的经典例子: 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发现和概括并随后被许多人类学家解说的“库拉交换圈”。对于这种具有经济交换功能的“臂饰”和“项圈”的交换圈, 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指出了单一经济理性维度解释的“荒谬”和“幼稚”(Leach and E. Leach, 1983); 另一个是吉尔兹发现和描述的作为“深层游戏”(deep play)的“巴厘

岛斗鸡”。边沁(J. Bentham)在《立法理论》一书中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深层游戏”的概念,指那些参与赌注过高的赌博游戏的人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逻辑,而吉尔兹揭示,巴厘岛人类似赌博的斗鸡游戏,在深层阶段更为重要的已经不是物质性获取,而是名望、荣誉、尊敬、敬重等“地位象征”,这种被边沁主义者视为非理性的“深层游戏”,蕴涵了巴厘岛人社会生活的“核心”驱动力和全部意义(Geertz, 1973)。大部分注重“小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实体主义学者都不认为小农是非理性的,只不过认为小农的理性是一种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另类理性”。蔡雅诺夫在《小农经济的理论》中认为,小农经济是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它对最优化目标的追求和对利弊的权衡,体现在消费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估量,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之间的计算(Chayanov, 1986/1925)。斯科特在他研究东南亚小农生计的《小农的道义经济》一书中也指出,小农经济行为的动机与“谋利”的企业家的行为动机有很大差异,在小农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其“规避风险”的主导动机和与自然的“互惠关系”,体现的是小农对抗外来生计压力的一种“生存理性”(Scott, 1976)。这类解释隐含的一种判断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独立的和抽象的经济行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社会行为,所以单一的经济推论是武断的和外来的逻辑。

与这种小农“另类理性”的解释相反,很多经济学家论证了“经济理性”解释小农经济行为的“普适性”。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一书中认为,小农并非没有理性的另类,他们作为“经济人”,其实很类似资本主义企业家,同样富有进取精神,尽管他们由于技术和资本的限制,经济规模较小、收益较低,但其生产趋近一种既定条件下较高效率的“均衡”水平,一旦有新的经济刺激,小农一样可以进行传统农业的改造,而不需要外来的集体组织(Schultz, 1964)。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一书中分析小农的政治行为时则更进一步,认为小农简直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公司”的投资者,他们的行动选择,完全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作出的(Popkin, 1979)。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在研究中包容和调和以上这两种解释逻辑的矛盾。黄宗智(Ph. Huang)在研究中国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时指出,人口的压力和耕田的减少,使小农采取了趋于“过密化”的生存策略,即在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小农为了生存仍不断增加单位耕田面积劳动力的投入,以换取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这种维持生计的策略,完全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策略,但这并不表明小农缺乏经济理性,一旦有了外部的刺激,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他替代的就业选择使小农耕作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增加,小农就能走出支配他们的“过密化”生存逻辑(黄宗智, 2000/1990)。

2. 关于“家庭理性”的悖论

家庭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在众多研究家庭问题的社会学文献中,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似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解释试图超越心理学和生物学塑造的关于家庭生活的传统图示,即把择偶、婚姻、生育、亲子关系等仅视为受“情感”的驱动或受“生理需求”的驱动。但这种解释多半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上,即家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单位,不是生物团体单位,家庭关系不是生物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家庭的产生、延续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理由”,这个“理由”也不是个人利益计算的“经济理性”,而是人类生存延续的“社会功能理性”。家庭的“世代继替”,成了解释一切家庭制度产生和存在的法则。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现代的“一夫一妻制”、部分游牧民族的“兄弟共妻制”,以及某些特殊的“走婚制”,择偶的“外婚制”和“乱伦禁忌制”,父权或母权的“家长制”和“氏族制”,继承的“长嗣继承制”、“男性后代分家制”和“按继承权序列分

配制”等等,其产生和存在都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体现世代继替的“社会功能理性”。

然而,社会交换理论在婚姻研究中较多的使用,也表现出一些社会学家明显地受到理性选择取向的影响。例如,认为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婚姻机率超过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是黑人男性用较高的社会地位去换取白人女性较高的人种地位的结果;认为包办婚姻是新郎的劳动力、彩礼和生活安定许诺与新娘的养育费用价格和品貌价格的交换,而“换婚制”只不过是这种交换的极端例子(Eshlman, 1985)。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以用“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领域”著名,他将理性选择理论广泛运用于诸如婚姻、生育、犯罪、歧视、竞选等非经济领域的举动,甚至被指责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贝克尔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他关于家庭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家庭规模或子女数量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是因为养育子女成本的上升和效用的下降,孩子的成本—效用关系是决定父母生育行为的关键变量。在他看来,生儿育女就如同购买耐用消费品,其成本是生育和抚养的费用与占用时间带来的机会成本,其效用是家庭情感的满足和家庭成员间的互惠,在一般情况下,对子女的需求同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一样,会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现代社会中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从而使孩子成本超过孩子效用时,自然生育率就会下降(Becker, 1976, 1981)。

贝克尔也注意到“家庭理性”的某种特殊性,他认为市场交易中利己主义是普遍的,而家庭中利他主义是更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没有效率,但在家庭里是更为有效的。在解释这种有效性的来源时,贝克尔说他与涂尔干的想法正相反,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扩大的优势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促进了有机团结,即参加者利益和思想情感的和谐一致,贝克尔认为有机团结是有效的劳动分工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利己的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可能会鼓励欺骗和逃避责任,而不是有机团结(Becker, 1981)。贝克尔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触及到竞争中的理性合作问题。

3. 关于“东方理性”问题的悖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欺诈、贪婪等非理性冲动以及获利的普遍欲望,都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相干,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韦伯试图从发生学意义上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的现代科层化组织首先在西方出现?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日常物质生活追寻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相反(布罗代尔, 1992—1993/1979),韦伯从精神和文化层次上寻根。他的研究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受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而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宗教观念,这种观念又最早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的“天职观”,即相信上帝安排下的工作神圣、节俭、核算、勤劳等等。韦伯认为,“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以恒,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韦伯, 1987/1958: 135)。

然而,韦伯认为东方社会缺乏这种宗教理性,他在进行文化比较时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一种另类的理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新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儒教的东方理性是不彻底的,在“外王”的经世抱负与“内圣”的安身立命之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内圣”的精神无法对世俗生活的理性化起到促进作用,儒教在中国的精致化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Weber, 1951; 苏国勋, 1988)。

韦伯的理论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他的理性化推论使他相信个体的有意义的理

性选择行动具有强大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他的人文关怀使他也看到理性化的铁律可能造成压制人的创造性的后果。

韦伯的理论也因此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韦伯的假设和文化解释缺乏理性选择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所需要的实证检验,萨缪尔逊以一种不屑的口气批评说,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理论“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证明”(Samuelson, 1979: 718)。中国和华裔学者则大多批评韦伯有贬低或曲解东方理性之嫌,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是传统中国社会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的判断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东亚经济的崛起是对韦伯的假设的“经验性挑战”,富有说服力地表明“新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要推翻韦伯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 1993: 128—151; 黄绍伦, 1991);有的认为理论上的儒家伦理与日常生活中遵守的儒家伦理并不一致,生活中儒家的“光宗耀祖”的成就目标和精神动力推动了经济发展(陈其南, 1987);还有的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也存在与新教伦理相仿的节俭、勤劳的工具理性,这是中国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余英时, 1987)。

4. 关于“集体行动理性”的悖论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给出一个“利益最大化”原理:理性人(经济人)的趋利避害行动会使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使社会收益最大化。他认为,在市场竞争中(自然状态下),虽然每个人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但却受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从而达到一种他未曾预期也并非出于他的本意的结果,就是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亚当·斯密, 1981/1880: 25—27)。

亚当·斯密似乎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过渡,他给我们描述这样一种理性选择的逻辑:

个人的理性选择——达到个人未预期的结果:集体的理性

与此相反,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无法从个人理性选择的假设推论出集体理性实现的必然结论,他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另一种理性选择的逻辑,即集体行动的逻辑:

个人的理性选择——达到个人未预期的结果:集体的非理性

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传统的群体和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形成的群体,会采取一致的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奥尔森则认为这种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他的研究证明,“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的利益”(奥尔森, 1996/1980: 2)。因为集体收益是公共性的,每个人为增进集体收益付出的成本并不能等同于他分享的集体收益,因而坐享其成的“搭便车”现象就会存在,从而造成个人增进集体收益的激励失效,所以群体越大,分享集体收益的人越多,人们越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奥尔森还认为,市场群体(如商人)是一种“排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一些人的获益是另一些人的损益,所以希望群体越小越好,而非市场群体(如游说群体)是一种“相容群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是“做蛋糕”的正和博弈,新参与的人并不影响原来成员的收益,所以希望群体越大越好。但即便是“相容性群体”,“搭便车”和激励失效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奥尔森认为,为了克服集体行动的激励失效问题,需要建立“赏罚分明”的制度,实行“选择性激励”,他承认经济激励并不是惟一的激励,也存在声望、尊敬、友谊等方面的“社会激励”,但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也是“非集体物品”,也可以用分析经济激励的方法去分析。尽管如此,奥尔森对“选择性激励”的有效性并不存有奢望,因为他认为,在大的群体中,为实行“选择性激励”而付出的监督成本可能总是高于其收益。所以,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实际上是一般情况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说亚当·斯密的逻辑代表了乐观的理性选择论,解释了个人理性选择的建构意义,那么奥尔森的逻辑则代表了悲观的理性选择论,解释了个人理性选择建构的局限性。

吉登斯力图克服类似的理论矛盾,他试图在强调结构决定意义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强调行动决定意义的解释学派之间找到一条调和的中间道路,就像他在政治上试图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找到一条“第三条道路”,所以他既批评了制度还原论忽视了各种社会自主性力量所发挥的充分作用,也批评了意识还原论忽视了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反思性控制。他在他的“结构化”社会理论中,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了“结构—行动二元论”,即一方面主张主体的有目的行动建构了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主张既有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行动发挥建构作用的条件和中介(Giddens, 1984)。

吉登斯从宏观的社会理论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调和集体理性悖论的行动逻辑:

主体有目的的行动——达到未预期的后果:该后果成为继续行动的条件

吉登斯的逻辑似乎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他没有解释“未预期的后果”是否符合集体理性的问题,从而留下了更宽广的解释空间,但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对此进行经验验证的实用意义。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理性选择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的特征是,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的而非整体主义的,是归纳的而非演绎的,是经验求证的而非哲理解释的。然而,最能代表其方法论特征、最受到争议、也最受到激烈批评的,就是其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与其相对立的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

英国研究社会分层的著名学者高德索普(J. H. Goldthorp)是社会学的“理性行动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倾向于理性选择理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就是主张通过个体行动的解释来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他们强调行动理论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相信在研究微观—宏观的联系时必须首先从研究个体行动的(预期的和未预期的)结果着手(Goldthorp, 1997, 1996)。

法国主张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社会学家布东,在一篇阐述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专文中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一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上的研究范式,包括绝大部分经济学传统的学者、德国古典的社会学家(如 Weber, Simmel, Sombart)、一部分意大利古典的社会学家(如 Mosca, Pareto, Michels)和美国的社會学家(如 Merton, Parsons),这个研究范式吸引了很多当代社会学家;二是“涂尔干主义”,即注重分析社会事实的总体规则,而较少分析有目的的个人行动的意义,结构主义是这种研究范式的代表之一;三是“解释学”(hermeneutic)的研究范式,即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的意义,特别是研究社会批判的主体力量,个人只有融入社会群体中才有解释的意义(Boudon, 1985)。

实际上,在众多遵循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中,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解释仍存在很多差异。哈耶克(F. A. V. Hayek)和波普尔(K. R. Popper)是比较激进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试图将方法论上的争论演变为意识形态的争论。哈耶克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能通过对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预期所引导的个人行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而那种把社会理解为独立于个人的整体的理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哈耶克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方法论层次,在理论传统上他激烈抨击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理性传统,特别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卢梭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和重农主义,却高度赞扬富有经济学传统的“英国个人主义”,在哲学上他批评了“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实论”,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唯名论”的必然结果,在政治上理性主义的假个人主义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源泉(哈耶克,1989:4—11)。波普尔认为,在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必须遵循分析个体行动的“情景逻辑”的方法,被观察到的行动可以在它发生的情景中被理性地“重构”,从而作为我们解释历史文本的起点;对于独立于个人的类似国家的“实体”,则要用“自由主义的剃刀”通通剃掉(Popper,1976、1968)。

韦伯、西蒙和布东则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韦伯是最早提出“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个概念的,他在去世的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中说,“社会学的研究,只能从一个、一些或许许多不同的个人行动入手,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个体主义’方法”(转引自Boudon,1985)。韦伯在这里特意为“个体主义”加了引号,以表明他所提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新概念完全有别于伦理学上所说的个体主义。实际上,韦伯与哈贝玛斯都强调注重主体行动意义的解释学方法,其区别在于,韦伯的出发点是解释有意义的个体行动,而哈贝玛斯的出发点是解释具有社会批判力量的群体行动。另外,与波普尔注重“情景”(situation)分析不同,西蒙强调“过程”(procedure)分析,他认为社会科学之所以要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主要是与人们的认知和决策过程有关(Simon,1982)。布东则明确指出,当个体主义加上方法论的定语后,它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只是指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重构与该现象相联系的个体行动选择,要把这种现象作为有目的的个体行动集合的后果,这并不排斥从宏观上研究价格与一般需求的关系或出生率曲线这种“结构性规则”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些规则的解释必须基于对个体行动意义的“理解”(Boudon,1985)。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它最受到指责的是其“社会原子论”倾向,即把社会现象归结为个人行动的结果,忽视了社会结构本身的影响,特别是没有弄明白整体的宏观现象并不是个体行动集合的自然结果。像萨缪尔逊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认为,一个人可以设法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但全体人则未必能够如此,在这里,对个人的选择行为及结果的考察虽然很有益,但遗憾的是它与就业总量没有必然的关系(Samuels,1979)。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实际上仍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行动决定论与结构决定论之争的一种表现,不同的是它是个体行动决定论与结构决定论和群体行动决定论两方面的争论。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这种方法论上的划分远没有这么针锋相对和旗帜鲜明。多数学者都往往采取多种分析路径,不过分析结论又确实受到一定的研究范式的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大多数主张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也都主张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我觉得这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所要求的,因为如果不坚持和相信有意义的个体行动对结构、制度、规律等的建构能力,那么结构、制度、规律等等要么成为无法进行理性分析的复杂变量的结果(如“文化”的影响),要么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驱

使的结果。从理性选择的理论来看,这种结论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过,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也对他们的主张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开始承认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限制,但认为这些限制只是决定了个体行动的可能场域而不是现实的场域,只是为个体行动确定了标向而不是路线(Boudon, 1985)。

四、理性选择理论受到的新挑战及其出路

近30年来,理性选择理论不断地从经济学领域向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理性选择理论或者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但这并不代表理性选择理论的凯旋,因为它的受关注正在使它受到一些严峻的理论挑战。

1. 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经济学本身的挑战。人们发现,即便在比较纯粹的经济领域,即便是严格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建立起来的复杂经济学模型,在解释多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时,事实上总存在一个既有变量无法解释的“残差”。无数经济学家都为这个无法解释的“残差”所苦恼,因为社会科学的模型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完全封闭的,“残差”的存在说明或许存在着从理性选择角度所忽视的自变量,而任何新的自变量的加入,都有可能改变原来模型的测算结果。就是说,即便是在经济领域,由于人们的理性选择涉及到个人的欲望、偏好、预期和决策,“不确定性”总是无法排除的幽灵,而一些表面看来非理性的影响力也会发生常规的影响。

其次是来自新经济社会学“嵌入理论”的挑战。它要求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更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即经济活动能否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抽象实体”按照理性选择的假设进行分析?“嵌入理论”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入社会生活中的,我们无法假定存在着只为满足个人物质欲望的“纯经济”活动,就像我们不能假定存在只为满足个人性欲的家庭。决定贸易、货币运行和价格机制的因素中,很重要的是由风俗习惯、公共义务、政治权威、法律行政要求、社会认同等构成的社群规范(Polanyi, 1958)。经济活动也并非完全受经济的正式制度支配,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受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调节,在市场竞争和垄断的支配之外,存在一个基本上是“非正式”的“日常物质生活”领域(布罗代尔, 1992—1993/1979)。“嵌入理论”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它所提出的命题,如一切经济行动都嵌入社会关系当中,经济制度是社会行动的建构等等,更重要的是根据这一理论所做出的经验研究的反证(Granovetter, 1985)。已有一系列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诸如求职、劳动力流动这样的“经济活动”领域,由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对人们的理性选择及其选择的结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的这种影响可以改变甚至改善基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可能的市场配置结果(Granovetter, 1982; Burt, 1992)。

第三是来自社会哲学“主体间性”认识论的挑战。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根据同样的经验资料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者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司空见惯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彻底性,要求在事实之间的因果推定中只存在一种“科学的”解释,它假定一切理性的推论逻辑都可以达成科学的“共识”。而“主体间性理论”(这个生僻的概念其实不过是互动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一种表达)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 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大多数与人们的主体反映有关(欲望、偏好、预期、

选择),因此研究者与被研究“物”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或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哈贝玛斯,1994/1985、1999/1991)。经验的客观性实际上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即解释者自身理论体系的影响和被解释者反映的影响,因而认识过程实际上是解释者作为直接参与者的理解过程。所谓理性的推论结果,不过是主体间的争论、沟通和达成一致。所以,“主体间性”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互为主体的理解方法,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的“换位思考”。

最后是来自人类学“遮蔽理论”的挑战。现代人类学似乎已经从一种追求无文字无数据信息的人类学转变为追求充分信息的人类学,而理性选择理论的难题之一就是理性选择者的信息缺失问题。一项严肃的人类学研究通常需要6个月以上的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这似乎只是人类学家的一种经验共识),对他们来说,宏观研究依据的大量所谓经验资料,都只不过是生活本文的符号系统,而且是经过很多层“遮蔽”(时空距离、话语叙说、语言转喻、数据抽象、逻辑加入等等)、造成大量真实信息缺失(“遗忘”)的符号系统(斯蒂格勒,1999/1994)。所以,人类学的工作,首先是“祛蔽”,是解释符号与生活本文的关系,是解释被“遮蔽”的生活逻辑,而不是强加于真实生活一种外在的理性逻辑。在他们看来,研究的价值,更重要的不是证明理性推定的结果或“大规律”的普遍性,而是解释超出理性推论的东西和“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

2. 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出路

理性选择理论要获得新的发展,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是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方面的欠缺,而是“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假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偏好做出选择,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的群体中,群体生活要依赖社会选择的理性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社会选择的理性,不是建立在一些人的“自由”和另一些人的“地狱”之间,也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自由”引导和芸芸众生的皈依顺从之上。

然而,从多样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出发,如何能达到并不损害个人“自由”的社会选择呢?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极具挑战性的,以致于当森(Amartya Sen)证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贫困不能以其拥有的财富来衡量,而要以其拥有的选择自由来衡量时,学术界为之一振,宣称这是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革命。森接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话题目就是《社会选择的可能性》。森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他证明了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在他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存在着三种对社会理性选择可能性(或曰理性的进步的可能性)的怀疑论:一是认为,在一定的社会中,由于不同的个人具有偏好和价值评判上的差异性,所以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和“一致的”(coherent)社会评价。这派学者在说明其观点时喜欢引用18世纪法国数学家关切的“投票悖论”(voting paradox)问题,即在投票人偏好差异的情况下投票结果会出现“循环大多数”的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是阿罗(K. Arrow)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这个定理被解释为严格地证明了从个人差异性偏好导出社会理性选择的“不可能性”(Arrow, 1963)。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人类达到预期目的的能力提出质疑,认为现实的长期历史一再表明,它总是被“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主宰。亚当·斯密、门哥(M. Menger)和哈耶克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如果现实中发生的大多数重要事件都是未预期的,那么我们主观上追求预期目标的行动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无意义的。三是怀疑维护共同价值行为规范的有效性,认为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无法超越狭义定义的“私利”,因而不可能发生在市场机制驱动之外的社会变迁,不可能产生所谓更加“社会的”、“道德的”和“约定的”的社会安排,这种善良的愿望只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已。

森在证明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时指出,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并没有错,但证明

的只是有条件的(在决策信息缺乏情况下的)不可能性,它的欠缺是没有充分考虑个人理性选择所依赖的信息基础,随着个人获得信息的增加,人们对持续获益的途径会有更清醒的理解,达到社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自由、民主、共同体、合作、社会公正都是在相互获得信息的增加中实现的。森认为,历史发展结果的“未预期”(intended)并不表明其不可预见(predictable),对重要的未预期结果的预见应当是我们理性分析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预见性的因果分析可以使我们减少和避免有害的未预期结果,更加接近社会理性选择。森还以中国的改革实践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来说明,经济学家对未预期结果的缺乏预见,是由于把社会变迁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的思维定式,他们往往忽略对深层的社会变迁如何促成特定的经济改革的过程进行分析(Sen, 1995、1999a、1999b)。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理性选择理论在自身发展中所探讨的一些基本命题,对这一理论最初的基本假定已经做出很多的修正和完善工作,所以任何批评和评价都应当考虑到这些理论发展,不能一味地指责其最初的假定,似乎只要证明这些假定的难以成立,就可以完成推翻理性选择理论的壮举。社会学对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评,应当尤其注意这个问题。总体上看,理性选择理论对现实的假定,仍然类似于物理学对真空状态的假定,它的最大长处就是逻辑清晰、操作性强,排除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比较便于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数理分析,在进行宏观比较分析和确定宏观社会现象之间的函数关系时,这一理论更加凸现出它的优势。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最容易受到指责,最容易显露它简化社会生活的重大缺陷。尽管理性选择论者在很多案例研究中做出很多理论的修正或增加了许多理性选择的约束条件,以便增强对复杂社会生活的解释力,但在更经常使用的数理分析中,迫于分析工具的限制,又不得不舍去复杂社会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这是理性选择论者的苦恼,同时也是非理性选择论者的难题,因为尽管后者可以为他们取得的对某些理性选择结论的“证伪”成就而骄傲,但在通过“证实”而建立“公理”和“规范性理论”方面却往往难以奏效,因为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往往使他们构建的理论失去任何操作性意义。

面对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态度,这些态度有时甚至陷入尖锐的对立状态:一是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只不过是现实中的一种极端情况或一种理想的特例,这种理论的“科学主义”的工具取向与社会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背道而驰,它的流行和带有霸气的扩展泯灭了社会学的创造力和人文关怀,使社会学沦为经济学的附庸,因而必须抵制这种取向的强化;二是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存在重要的缺陷,但目前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理论方法中最好的也最具有操作性的一种,社会学要建立规范性理论体系,必须沿着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向前推进,社会科学要想成为一种“科学”,就要减少理论解释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经验研究学科建立起统一的规范体系和数理语言;三是认为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带有边缘学科的特征,因而在理论和方法上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宽容态度,博采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甚至哲学母体的众长,大可不必去追求一种统一的逻辑语言,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人文关怀精神具有互补的意义,这种互补可以使我们达到返回古典理论时发现的那种理论均衡,它使社会学具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对话领域。

我们应当看到,一种理论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的思维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理论上的对话和争论非常必要。理性选择理论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它毕竟是我们的理论讨论必须关照的基础体系之一。社会学要在它的各个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系列规范的中层理论,必须注重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视角,你可以

不同意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和推论,但你不能没有对一种规范的理论体系的追求。理性选择理论在自身的发展中,也要克服简化社会现象的缺陷,更加注重研究影响社会现象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吸纳其他理论取向提出的“挑战”和“反思”,增强自身理论体系的包容能力。

其实,如果说理性选择理论的主张在社会学家中的扩展,代表了一种社会学的经济学化趋势,那么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把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社会领域的分析以及对社会变迁凸现的关注,则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二者之间的张力、互补和融合,可能正是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动力和出路。

参考文献:

- 奥尔森,1996/1980,《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布罗代尔,1992—1993/1979,《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卷本),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
- 陈其南,1987,《家庭伦理与经济理性》,《当代》第10、11期。
- 哈贝马斯,1999/1991,《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 ,1994/198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
- 哈耶克,1989/194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黄绍伦,1991,《中国文化与香港的现代化》,载黄绍伦编,《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香港:商务印书馆。
- 黄宗智,2000/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 加尔布雷斯,1983/1973,《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
- 金耀基,1993,《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斯蒂格勒,1999/1994,《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
- 斯乌利,2000,《理性选择理论在比较研究中的不足》,《国外社会学》第1期。
- 苏国勋,1988,《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三联书店。
- 韦伯,1987/195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
- 吴国盛,2001,《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亚当·斯密,1981/1880,《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
- 余英时,1987,《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社。
- 张宇燕,1992,《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周长城,2000,《理性选择理论及其研究》,《国外社会学》第1期。
- Abell, P. 1992, “I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Rational Choice of Theory.” in J. Coleman & T. Fararo (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Newbury Park: Sage.
- Arrow, K. 1963, *Individual Values and Social Choice*, New York: Wiley.
- Becker, G. S.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hman, J. 1992, “The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Explanation.” in J. Coleman & T. Fararo (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Newbury Park: Sage.
- Boudon, R. 1985, “L’individualisme Methodologique.”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Symposium*,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France S. A.
- Buchanan 1954, “Social Choi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 Butt, R.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 1986,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einemann.

- Chayanov, A. V. 1986/1925,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shleman, J. R. 1985, *The Family*, Massachusetts; Allyn and Bacon.
- Frantz, R. S. 1988, *X Efficiency: Theory, Evidence and Applicat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Friedman, M. & Hechter, M. 1988, "The Contribution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o Ma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 6.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ldthorpe, J. H. 1996,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Data-Sets and Rational Action Theor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 1997, "Rational Action Theory for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of Oxford University.
- Granovetter, M. 1982,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in P. Marsden & 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Hedstrom, P. 1996, "Rational Choice and Social Structure: On Rational-Choice Theorizing in Sociology." in B. Wittrock (ed.), *Social Theory and Human Agency*, London; Sage.
- Leach, J. W. & E. Leach, 1983, *The Kul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denberg, S. 1990, "Homo Socio-Economicus: The Emergence of a General Model of Ma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46.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eto, V. 1966, *Sociological Writings*, London; Pall Mall.
- Parfit, D. 1986, "Prudence, Morality and the Prisoner's Dilemma" in J. Elster(ed.), *Rational Choice*, Oxford; Blackwell.
- Polanyi, K. 1958,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opkin, S.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pper, K. R. 1976,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68,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s." in T. W. Adorno et al.,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Samuelson, P. D. 1979,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Scott, J.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the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H. A.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cheff, T. J. 1992, "Rationality and Emotion: Homage to Norbert Elias." in J. Coleman & T. Fararo(e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Newbury Park; Sage.
- Schultz, T. 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95,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 1999a,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Choice." (Nobel Le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 1999b,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Veblen, T. 1994/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Weber, M.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by Hans H. Gerth, New York; Free Press.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宛丽